党史资料丛书

湘赣革命根据地

（回忆录）

（一）

内部资料
切勿外传

部学院

湘赣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协作小组编

一九八七年十月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A1/579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
66025623

目　录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
66025623

回忆湘赣苏区工作……任弼时（1）
回忆湘赣苏区……王首道（20）
回忆湘赣苏区……张启龙（56）
回忆湘赣苏区……李　立（87）
赣西南苏区革命斗争历史的回忆……曾　山（107）
攻克吉安城……肖　克（128）
消灭唐云山旅……周祖九（131）
攻克吉安府……曾光明（135）
峡江会议前后……何长工（140）
对湘东南总暴动的看法……朱家胜（146）
红二、四团的建立……胡嘉彬（153）
红独四团的战斗生活片断……王友生（155）
东固平民银行……汪安国（158）
路口大捷……刘增干（163）
攻打安福……彭德怀（166）
回忆吉安西区革命斗争……肖望东（1[illegible]）
参加第一次全苏大会前后的回忆……尹兰玉（171）
难忘的岁月……旷　龙（1[illegible]）
谈湘赣湘苏区土地革命……李六如（186）
我在湘赣苏区……刘俊秀（189）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
藏書

回顾湘赣苏区工作

——1944年10月26日在湘赣工作座谈会上的总结

任弼时

我想我们经过这几天的座谈之后，对湘赣苏区历史发展的过程，较之过去是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但也只是比较的，因为时间很短促，一方面，我们没有可能把实际情况详细地在这个会议上来讲，另方面又没有许多文件作为我们现在讨论的根据——无论哪个时期都没有旧的文件可参考，因此我们还只能是粗枝大叶地对过去总结。我的讲话也不能作为湘赣问题的最后总结。其所以不能作为最后结论者是因为湘赣过去所执行的路线与当时整个党的路线是分不开的，而那个时期党的路线究竟如何是需要"七大"作结论的。在"七大"以后，根据"七大"的认识来讨论湘赣工作，才能够有更完全的认识。但是这次的座谈也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的共同意见或者初步的结论，因为大家已经有了一个共同的看法，这是我首先要声明的。

一、对湘赣历史的看法及这次座谈湘赣问题的目的

我们在湘赣作的工作到今天已经有10多年了。我们要以历史的观点去看问题，所谓历史的观点，就是需要懂得我们在湘赣工作的时候是在四中全会以后，不管旧省委也好，后来的省委也好，都是执行了四中全会以后的路线的。但那个时候不知道四中全会以后的路线是错误的路线。这个错误路线是过了七、八年之后才发觉的。当时许多同志执行了四中全会的错误路线也没有把它当错误路线；相反的，倒

还觉得很合胃口、同意了那个路线、拥护了那个路线，现在看来当然是错误的。

现在我们来检讨历史问题的时候、应该在各种不同的历史情况下了解历史问题，检讨自己的错误。过去在同一错误路线下也有各种不同的情形的。比如有一种人，他当时执行这个路线，他是把那个路线当作正确路线来执行的，这种人的反省，应该反省自己在那个时期的思想方法，就是说应该反省自己在当时为什么同意了那个路线，为什么拥护了那个路线，这种人对党是忠实的，只是思想方法错误了，需要自己在这方面自我批评：虽然在错误路线下造成的罪恶应由路线负责，但自己也应反省自己为什么同意那个路线，执行那个路线。另外，还有一种人，在那种错误路线下面，利用党的错误路线来达到自己私人的目的，这就是说品质不好的人，他利用党的错误路线进行自己私人的活动。这种人不仅仅要反省他的思想方法，而且要反省他的品质有哪些毛病，造成什么罪恶。再还有一种人，虽然在错误路线之下，但他并没有完全同意这个错误路线，他对错误路线有抵抗、有不满意。这种人在任何一个苏区里面都是有的，就是说他对当时的路线不满意，提出过不同意见，反对过，但他也没有能够把这个错误路线完全纠正，而只是在具体执行中没有完全执行这一错误路线。这些同志也应该反省，反省自己当时为什么没有能够坚持自己正确的意见。他如果是这样反省，也可以得到一些经验教训。还有的同志有官僚主义倾向，脱离群众，作风不好，因而使工作受到更多的损失等。总之，是有各种

各样的人。

今天我们来研究历史问题的时候，各种各样的人对自己应该根据各种不同的情况来加以检讨和反省。这样对各个人，就可以得到一定的好处。再就是我们不能以现在的眼光去看历史问题。今天的观点是什么？今天我们是统一战线，与大资产阶级进行共同抗日的统一战线。我们不能够拿这个尺寸来要求过去，去看过去。那个时候的情况，我们还没有具备与大资产阶级大地主合作的条件，但在"九一八"之后，整个中国在阶级关系上是起了新的变化的。在今天看来，当时的某些社会政策可能改变或者应该改变，比如在十九路军问题的态度上，我们应该采取和他们合作打击蒋介石取得五次战争的胜利。那个时候没有这样做，这是错误的。但是超过这些要求，说那个时候与蒋介石也应该合作，这就不对了。那个时候的可能还没有，就是说与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合作还不可能，还没有这种条件。所以我们说不能以今天统一战线的尺度去看那个时候的问题。我们也应该看到那时的某些可能采取的统一战线的措施，比如"九一八"以后，我们在某些政策上应该加以改变是应该的。这是我们在检讨历史问题时应有的观点，也就是历史观点。

其次，我们在研究历史问题中，应该有实事求是的精神，以此种精神来检讨过去的工作。就是说，一方面我们要看出错误并研究犯一些错误的原因，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哪些地方有成绩。我们不是否定一切的态度。我们也需要研究在错误路线下还能够找出错误的原因是什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么。大家要很冷静很客观的来分析当时的情形，如错误何在，原因是什么，在哪些地方还有成绩。这种态度是很需要的。在教育党员干部时必须具有此种态度，也只有如此才合乎事实。

我们检讨历史问题的目的，对党来说是要很好的检讨那个时期的经验教训；在个人来说是要弄通个人思想，基本上不是追究责任应归哪个人负，而是把思想搞清楚，以对过去错误的检讨来教育全党。总起来说，我们不是过分追究个人责任，而在个人来说则应着重反省自己犯了什么错误。如此，才能够对党对个人都有利益。

这就是我们研究湘鄂问题时应该采取的态度和目的。

二、关于湘鄂历史上各个时期党内路线的估计

为着讨论的便利，我们曾经分四个时期，即：临时省委为一个时期，旧省委为一个时期，新省委为一个时期。最后一个时期为谭余休同志在那里坚持游击战争的一个时期。最后这个时期，干部到会的甚少，我们很难得到许多具体问题。这次我们座谈主要还是弄清旧省委与新省委这两个时期之内的一些问题。

现在我把临时省委这个时期以前的情形简单地说一下：

根据这几天的座谈，大家有一个共同的认识：湘鄂这个区域在大革命时期就有党和群众斗争的基础。在永新、莲花、茶陵、宁冈等县内，大革命时就有群众斗争，特别安源等地方的工人运动有很大的影响，北伐时也经过那些地方。湘鄂这个区域后来成为中国苏维埃运动中重要地区。中国苏维埃根据地的建立，不是首创地，也是第一批

（大概除了广州暴动之外，它是首创的）。这不是偶然的，首先是有群众斗争的条件，其次是有好的地理条件。如井冈山是很好的地理条件。在政治条件上说，它是比较偏僻的两省交界或三省交界的区域，统治阶级在那里的力量薄弱。因为这些条件，所以以后朱毛选择了这个地区，创造了苏维埃政权。毛主席曾在这里搞了一年多。在这一年多当中，建立了政权，在宁冈、永新、茶陵建立了苏维埃，叫作革命割据：创造了一套政策——包括建政、建军、建党的各种政策。这是一套正确的办法。毛主席这一套政策的基本精神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按照实际情况规定我们的政策。所谓保存了毛主席的精神者，我看也就是保存了毛主席的实事求是的精神。

朱毛红军离开这个区域以后，在立三路线时期，湘赣边的党是否执行了这个错误路线呢？应该说湘赣边党的领导机关一般的是接受和执行了这个路线的。比如湘东南的五次暴动，赣西南的八次攻吉，把地方武装集中起来、组织行动委员会等。至于执行这个路线是不是下面还有一部分同志在那里实事求是地按照毛主席的精神奋斗呢？那还是有的。某些党部、某些同志，许多党员干部不满意立三路线，保留了旧的一套好的东西的还是有的，我看毛主席的这种作风不仅在湘赣这个区域才有，即在其它区域执行错误路线下也是存在的。当然湘赣这个区域是毛主席直接领导的、直接参加的一个区域，毛主席的影响更深更广泛，这也是自然的。我觉得在湘赣的军队里面毛主席的传统保持的更多一些。这一点我是这样的看法，大家也还可以考虑。

临时省委时期：

临时省委和新省委两个时期都是执行了“左”倾的路线，而且这个路线是一天比一天更加“左”的。这样的估计是合乎事实的，更确切地说，旧省委执行的是四中全会以后到中央搬到中央苏区以前的路线，新省委执行的是中央搬到中央苏区以后的发展得更“左”的路线，包括五中全会。四中全会虽然形式上停止了立三路线，而新的“左”的路线在四中全会后不久就产生了，四中全会反对立三路线并没有解决问题，因为它没有能够揭发立三路线的社会的、政治的根源。所谓社会根源就是党内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政治的根源是大革命失败以后广大群众对国民党统治者非常仇恨的思想。这两个思想都是发生“左”的根源，都容易走向“左”的错误去。四中全会也没有指出立三路线的思想方法是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总的说来，四中全会虽然反对了立三路线，并且批评了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但是并没有看到这些“左”的根源何在。四中全会以后的中央仍然保存了立三路线时期的那一套思想方法。“左”的根子并没有去掉；而且四中全会不正确的提出了反对党内右倾思想，说右倾是主要危险。因此四中全会以后中央的政策，如土地问题、劳动政策等以及许多的个别政策，都表现得很“左”。但是我们说形态完备的路线之形成还是在“九一八”以后。因为日本打中国，有三次战争的胜利，又有几省的大小实就认为革命形势到了，于是提出要完成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认为中国已经革命化了，认为国民党的统治是总崩溃，这是夸大一面，夸大了国民

要崩溃的一面。提出了不正确的任务和斗争策略，成为一个极"左"的路线。这个"左"的路线是否把各个区域普遍的统治了呢？是否各个苏区都被它统治了呢？那就不一定。比如中央苏区就遇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实事求是者的抵抗。毛主席就不赞成打大城市。但是是否部分的也被执行了呢？是的，如分配土地上就执行了。在中央未搬到中央苏区以前，中央虽然派我们去了，后来又派恩来去了，但在博古、洛甫未去苏区之前，极"左"路线还没有完全统治中央苏区。我们去的时候。中央局的书记开始是项英，后来是毛主席。以后恩来同志来了。他当中央局书记时，虽有五月决议案批评了中央苏区的机会主义，提出打赣州，赣州没有打开，回来后就再没有打大城市。这就是说，实际上并未贯彻执行四中全会以后的路线。

我想在湘赣，临时省委虽执行了"左"的路线，但也并没有充分执行。这就足以解释为什么以后中央搬到中央苏区以后，福建打出一个罗明路线来。江西虽然没有指出省委有路线错误，但也打了几个地区，如处分了邓、毛、谢、古。这就表明苏区并没有全部执行他的路线，所以被认为机会主义的动摇。认为福建是罗明路线。江西几个地区是机会主义，这实际上就是说明那时的中央局的领导有问题。

新省委执行了中央搬到中央苏区以后的路线，中央搬到苏区以后，博古、洛甫亲自到苏区执行极"左"的路线，这对于苏区就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们认为必须彻底执行中央的路线，在这个情形下面认为旧省委是机会主义动摇，撤销了旧省委，组织了新省委。这个新省委

在思想上、政策上比旧省委自然表现要更"左"。但是我们今天来说，这个新省委是否满足了当时的中央的要求呢？也没有，也没有完全彻底地执行他们的路线，因此说新省委还有右倾机会主义。

这里我顺便说到一个问题。有同志说，派刘士添到中央报告是一个错误。我说这也只是相对的正确。刘士添这个人品质不好是事实，但是派别人是不是也会戴一个机会主义动摇的帽子回来呢？我可以肯定说一定要戴上。为什么呢？中央到中央苏区以后，为了贯彻自己的路线，采取的办法就是打倒一切，否定过去，把罗明路线的帽子到处戴上。因此我想无论是王震去也好、启龙去也好，都免不了戴一个帽子回来。恰好湘赣那个时候失去了上犹苏区，红军有些缩小，那一定会戴上机会主义动摇的帽子的。今天我们检讨湘赣历史，我以为应否定那时中央对旧省委是机会主义动摇的估计。因为这不符合事实。随着这个否定，当然改组省委也是错误的，后来打击省委这些人是更不对的。我看不仅仅对湘赣右倾机会主义动摇这个估计不对，就是"罗明路线"、江西几个地区的机会主义的帽子戴得也不对。我想统统应在否定之列。如果我们现在研究罗明路线这个问题，我看错误的不是罗明。罗明倒是提出了一些边界上斗争策略问题，如武装斗争、商业政策等。他是反映了一些实际情况的。这些问题既经提出来了，应该很好的去研究解决。但那时中央不但未去研究，反而抓住这一点来进行打击他。

旧省委和新省委所执行的路线，旧省委去了以后在土地政策方面

改变了毛主席过去分田原则，根据当时党中央的决定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重新分配土地虽是对的，但问题不在这个地方，而是分田的方法不对头。此外，如驱逐豪绅地主出境也是“左”的。在劳动政策方面是执行第一次全苏大会所通过的七十二条劳动法，这里面有八小时工作制那一套，把大城市的东西搬到农村里应用。文化政策也是共产主义教育的一套。苏维埃政权建设也是根据全苏大会所通过的宪法大纲所进行的。那个宪法很“左”，在那里面规定了一切剥削者都没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规定富农没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简直和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差不多了，这就表明了对革命性质的模糊。照那个东西看起来，只有雇农、贫农、中农才能够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各种政策方面，湘赣也是执行了这一套，虽然执行得不彻底。军事政治方面，在蔡会文同志去了以后，政治工作采用了政治工作条例，干部政策方面注意成份，强调无产阶级骨干，这一套东西，在四中全会就提出来了。肃反是在中央苏区时特别受命为中心的工作。军事行动方面，在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这个“左”的口号下面，打过一次分宜，但只是打这一下，以后就没有打了。这一套“左”的政策是为旧省委采取了的，但是执行得不彻底。比如有些地区分田还是按人口分，军事政策上要与湘鄂赣打通，打了一下没有打通，就不打了。因此后来受了批评打击。

新省委在思想上政策上比旧省委更“左”一些，在某几个政策上就特别表示特出的“左”。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一．在土地问题上查田查阶级方面比旧省委表现得更"左"。旧省委在土地问题上也是"左"的。如驱逐豪绅地主。新省委没有驱逐豪绅地主．但查田查阶级，不是对地主阶级的，而查田查阶级却侵犯了农民的利益，特别侵犯了中农的利益，把中农当富农，把富农当地主。甚至查出一些干部家庭成份不好，认为这是阶级异己分子而放在劳改队，甚至当作反革命。当然省委并未决定查田要查几代，然而实际上是查了几代。

第二．在思想斗争中打击政策也特别"左"。反对王首道的机会主义动摇是错误的。那个时候的打击政策，在湘鄂已经发展得很厉害，今天我们看，对王首道、张启龙以及甘泗淇这些同志的打击都是不对的，一直到我们与夏曦同志的斗争方法也有错误．这种打击政策一直继续到六中全会时才基本结束。

第三．是在群众动员工作中的强迫命令。这里面包括扩大红军、动员担架伕子，借公债等，比过去旧省委时代也为突出。打击政策不仅在党内存在，而且扩大到了群众里面去了。

这三个问题是新省委特别突出的"左"一些的政策。

在肃反政策上，好象有这样一种空气，说吴德峰来了以后肃清反闹得很厉害。在这个问题上，今天我们也要实事求是地查一查，吴德峰来了以后，的确在杀的干部中有些是特别重要的，如袁德生、陈韶、胡波、李梦弼等等．这是过去省委捉下来不敢杀的。吴德峰来了杀了这一部分重要干部，这是严重错误，是有罪恶的。但是吴过来以

后捉的人的数量并不多：据大家凑起来的能认得的，吴过来后捉的较重要的干部杀了的和病死的共15个。至于下面是否捉了很多人，大家也可以回忆一下。当然在这一批捉的人里面有重要干部和袁德生等。再则，把劳动感化院的一些已经判了徒刑的又杀了，这几件事是办得很不好的，是不应该的。但是在吴德峰来了以后的肃反是否比第一次肃反高潮时闹得更厉害、更恐慌一些呢？我问了几个同志，在群众中造成恐慌的还是第一次肃反高潮，但第一次干部恐慌情绪少一些，第二次肃反高潮捉的干部多、群众少。在干部中造成恐慌这是可能的。第二次肃反高潮与第一次肃反高潮比较起来，恐慌还是第一次，肃反要乱一些，捉的杀的也要多一些，县级干部也不少；而第二次肃反则比较有秩序些，捉的也比较少一些，但其中重要干部占的数量为多，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高潮时社会秩序没有建立起来，区乡都可以杀人；后来秩序渐渐建立，已经不象过去一样混乱。

不能乱杀人了，裁判部已经设立了，不能随便杀人。杀人要经过省府批准（逃兵例外），吴德峰同志估计第二个时期杀的人质量比较高一些。这是个事实。为什么第一次肃反时临时省委比较坚决，而在第二次肃反或刘士杰捉了许多人时就动摇了呢？因为第一个时期捉的人主要是西路分委的干部。那个时候，对西路分委有这样一种观感，觉得西路分委"AB 团"多，这也是自然的。因为富田事变发生在那里。但这里面也还是存在着不自觉的山头主义的，觉得湘东南的干部可靠些，对西路分委的干部因为有富田事变的关系，怀疑多些，又因

受了中央的命令。因此肃反坚决些。而第二次发生动摇，因为肃到湘东南这批干部身上来了，加上自己在赣西南提拔起来的一批干部（这是本地的，是经过旧省委提拔起来的，是自己提拔的。所以比较熟悉一些），因此对肃反发生怀疑。于是派人到中央报告，首道、王震、甘泗淇、启龙都曾有怀疑。但派人去报告恰恰碰到更"左"的路线来了。他是以更"左"的精神来看苏区的问题的，所以反而批评旧省委对反革命容忍姑息。不仅仅没有支持旧省委对过去肃反的怀疑，反而批评旧省委右倾。第一次与第二次肃反，军队里面都要好一些。根据最近所对出来的名单，看吴德峰过来之后，杀的人并不多（有重要的而且杀了一些重要人），为什么大家都对吴德峰略有很不好的观感呢？这与吴德峰同志本人作风及保卫局工作作风有关系。过去把保卫局的工作人员搞得神气得很，同时吴德峰同志本人作风上也不太好，保卫局有特务作风。所以引起大家的不满。但实际上并不是说吴德峰同志过去搞得大闹天宫，我想这种估计是合符事实的。

以上是新、旧省委在肃反工作上的比较。新省委所提出以赤色恐怖镇压白色恐怖的口号是不对的，但在这个口号下面杀人也还不算很多。当时刘士杰有这样意见，说每一升米进永新城就要杀。这个意见是被大家反对了。江春和曾杀了一个伙夫官。但这件事并不是当时省委或政治部决定的。这件事还是受批评的。

新、旧省委都是执行"左"的肃反路线，新省委时期表现得更"左"一些。表现在旧省委还犹豫的，新省委肯定了、杀了、提杀了

一些重要干部如袁德生等。但也不能说后来肃反是怎么样扩大化，因为建立了革命秩序，不会使肃反那样无组织地发展下去。

关于军事政策。新省委在军事政策方面比旧省委更“左”的有哪些方面？我看旧省委在执行“左”的军事路线方面，打过一次分宜，而新省委在五、六两月基本上接受了新的军事路线（十七师北上也是错误的）。

至于其它政策，如劳动政策等，都还是继续旧省委的一套，没有什么变化，

总起来说，就是新省委继续执行“左”的政策，在思想上比旧省委更“左”一些。在各种政策上，特别在上面举出的那些政策上更加“左”得突出一些。这里也要说明，新省委执行的政策虽然更“左”，但并没有完全达到当时中央所要求的程度，因此使得中央后来还批评新省委有右倾机会主义。

现在再谈一谈军事问题，在国内战争的环境下面，在苏区斗争的环境下面，军事问题是占一个重要的地位的，有时候甚至是起决定作用的。军事问题包括军事建设，军队作战方针。我有这样一种认识，大家也可以考虑一下，就是朱毛红军传统在湘赣军队中保持得更大一些。比如红军三大任务的作法，在湘赣苏区就保持得比较大，直至蔡、肖去以前还没有改变。后来虽然变了，但在后来的斗争中，在长征中，也还是多少采取这些办法。在作战方针上，虽然旧省委在“左”的路线下也打过分宜，但经过那个尝试后，碰了钉子，马上就停止了，而

采取了游击战争与运动战的方针。在后来新省委时代也执行过新的军事方针、如修碉堡、筑工事等，但搞了两月之后，事实上告诉我们不能那样做，所以以后也改变了，由永新县转移到遂万泰方面行动。在第一次长征行动中虽然有许多缺点，但基本上完成任务。所以这一点可以做出这样的结论，就是在军事作战路线上还是保持了一些朱毛红军的传统。这一点也就是我们能够解释为什么我们还能够保存这样一些力量和一大批干部，并且能够取得一些胜利。

一般地说，红军产生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旧的军队暴动过来改编为红军的；一种是当地群众斗争发展到武装斗争再发展为地方游击队，由游击队而集合成红军的。湘赣红军是第二种形式产生的。湘赣红军是由游击队集合而为大队伍的。独立师是这种情形，赣西南二十军也是这种情形。这样产生的红军有什么特点呢？

第一．这样的红军与地方的关系比较密切．它是在群众斗争下面产生出来的。

第二．这样产生的队伍对地方党政，一般的说，服从习惯要好些，因为一个小游击队过去省委区委都可以指示他们行动。

第三．这样产生的红军，干部的机动性、独立活动的能力要一些，士兵的觉悟程度、政治条件、政治基础也要比较好一些。因为他是在群众斗争中由最积极的分子集合而组成的。

湘赣红军具备这些特点。我们应该估计他的政治质量是好的，对这个部队的战斗力也应该估计是相当强的。

对于创造这个队伍哪些人是有功绩的呢？哪个同志是这个队伍历史发展上的重要人物？我们说从本队伍里产生出来的重要人物应该是谭思聪、王震、谭家述等同志。这些人都应该作为这个部队的创造者。李天柱、肖克、蔡会文这些同志是外面来的帮手。他们对部队的提高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基本的创造者应该是上述那些人。

那么湘赣这个部队有没有弱点呢？他是游击队集合而成的队伍，民主性较大一些。这一方面可以说是它的长处，但是另方面部队的散漫习气也大一些。我过去是这样看法：他的战斗力相当强。但游击习气大一些。蔡、肖来了，对这个部队战斗力的估计，说是只能打一个营。此事据肖克同志说，记不起蔡会文曾这样明显讲过（谭余保：我记得这件事，他是这样讲过的）。这种估计显然是不合事实的。为什么？因为在蔡、肖来之先，它曾经消灭过一个团。至于他们来的时候，是不是这个部队的战斗力有些削弱呢？某些削弱在当时的情况下当然也是事实。原因是什么？在我看有这样一些：一般的说是那个部队巩固不够。但是这种估计不是那个时候所说的右倾的结果，也不是那时所看，由于某些人可疑而造成的。而是那个部队在组织方面还有缺点，再加上那时执行的路线，打分宜时受了一些挫折，伤亡了一些，逃亡了一些，病员很多。由于这些情况使当时部队的战斗力有些削弱。但也不能估计得这个部队当时已经削弱得只能打一营人。

蔡、肖去了以后对这个部队起了积极作用没有？应该承认起了积极作用。表现是在部队的教育方面、部队的正规一些方面是起了积极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